

四、東亞儒學經典詮釋史的四書學

黃 俊 傑*

本次研討會主題是「東亞的四書學」，所採取的基本上近於平石直昭教授所謂的「橫貫東亞全體的儒教教理的發展史之分析視角」。從這個研究視野來看，東亞的四書學解釋史研究可從許多問題切入，其中較能產生具體成果的問題如下：

- 1、東亞思想史上的經典詮釋者解釋經典呈現何種類型？他們透過何種方法與途徑以建構詮釋的類型學？
- 2、某些經典，例如《四書》、《易經》、《詩經》，到底具有何種神秘的吸引力，因而可以吸引數千年來詮釋者的心志？這種吸引力來自何處？
- 3、東亞經典詮釋者選擇某一部經典或經典中的某些篇章進行詮釋時，依據何種選擇標準？為什麼？
- 4、東亞經典詮釋者如何透過經典詮釋而安頓他們自己的主體性，並建構他們的文化認同或政治認同？

以上這些問題的探討，都可以印證楊儒賓教授所說，解釋者均有其理論基礎，也都有其對經典價值的契入（commitment），而且解釋者的價值「契入」愈深刻與理論基礎愈厚重，愈能在經典解釋史上留下印記。

從東亞經典解釋史來看，為什麼《四書》的解釋代不乏人，而且成為東亞儒學發展史的公分母呢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《四

*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／中研院文哲所合聘研究員

書》言簡意賅，內容深刻，使後代的經典解讀者溫故就可以知新，體驗經典作者的心志於千百載之後，而成為經典作者之異代知音。舉例言之，孔子（551-479B.C.）畢生慕道求道，欣夕死於朝聞，以「道不行」而有心「乘桴浮於海」。孔子求道心志之堅之篤，使他的學生深歎欲從而未由。一部《論語》正是先秦孔門師生求道向道的心路歷程的實錄，孔子兩度以「一以貫之」形容他終生所抱持的「道」。在《論語》解釋史上，歷代解讀者對孔子「吾道一以貫之」解釋眾說紛紜，這固然與解讀者個人之思想傾向、方法論立場以及時代思想氛圍有關，但是，在《論語》文本中孔子之言的模糊性，也為後代詮釋者保留了極大的詮釋空間。孔子在春秋時代（722-481B.C.）以「吾道一以貫之」一語，自述他艱難的心路歷程，引起了兩千年來東亞各地儒者諸多解釋。中國儒家經典詮釋是一種體驗之學或牟宗三先生所謂「生命的學問」，但是，每位解讀者之生命歷程與體道經驗各有不同，各從互異角度切入，此所以孔子「吾道一以貫之」之詮釋，歷二千年而說解紛紛，各種詮釋典範之間之「創造的緊張性」，乃成為中國以及東亞儒學思想史綿延發展的內在動力。

在數千年東亞歷史的轉型期中，經典解釋的變遷一直在文化變遷中發生指標性的作用。中國儒家經典中許多價值理念如「夷夏之防」、「民貴君輕」等，在傳到日本與朝鮮之後，就會在中華文化價值與日韓地域特性之間，產生某種具有創造性的張力。《論語》中「道」，德川儒者理解為「先王之道」，這種解釋減低了如果「王」與「道」不合一的狀況下，儒者所面對的抉擇的困境。孔子與孟子都體認「道」雖然孤行而不殆，永存而不亡，但在歷史進程中並不必然落實在「王」者的政治施設之中，萬一「道」不被「王」所實踐或甚至被「王」所出賣，孔子自歎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」，孟子則甚至鼓吹諸侯起而統一天下，以「不忍人之心」行「不忍人之政」，易姓革命，使「王道」政治重見天日於人間。孔孟這種政治思想對德川日

本政治體制，仍有潛在的威脅，所以，德川儒者以「先王之道」解孔子的「道」，可說拆除了孔子政治思想中可能引爆的雷管，使《論語》更能融入德川政治與社會之中。此外，《論語》中所見的「夷夏之防」這項價值理念，也歷經日本儒者賦予新詮釋，他們以「文化認同」解構「夷夏之防」中的「政治認同」。例如伊藤仁齋解釋《論語》「子欲居九夷」時，就說「吾太祖開國元年，實丁周惠王十七年。到今君臣相傳，綿綿不絕。尊之如天，敬之如神，實中國之所不及。夫子之欲去華而居夷，亦有由也。今去聖人既有二千餘歲，吾日東國人，不問有學無學，皆能尊吾夫子之號，而宗吾夫子之道，則豈可不謂聖人之道包乎四海而不棄？又能先知千歲之後乎哉？」（《論語古義》，卷5，頁138）伊藤仁齋以日本為孔子欲居之地，在《論語》解釋史上可謂創新之見解。

數千年來東亞儒家經典的解讀者，在解讀經典時常常展現不同程度的「即存在以論本質」的思想傾向。在中國思想傳統中，中國思想家常常在「存在」中掌握「本質」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思想家都尚具體而不喜蹈空，崇實測而不尚冥思，體孔子「一貫之道」於人倫日用之間。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學呈現實踐詮釋學意涵。東亞思想家解經的方法固然不一而足，但是這些方法都與「實學」思想傳統有其深刻之關係。以「實學」為特徵的儒家經典解釋學的一種類型就是詮釋學作為政治學出現。例如孟子到處號召諸侯統一中國。孟子的政治思想在宋朝引起很大的爭議，那些批評孟子的人，是以罵孟子為手段，其目的旨在罵王安石，因為王安石宣稱是當代的孟子。另一種類型是詮釋學作為個人心路歷程的表述，例如朱子與陽明雖然是在解釋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但實際上是在講自己的心路歷程。第三種類型是詮釋學作為護教學。許多思想家重新解釋《論語》，是因為有心於撥亂反正，通過重新解釋經典而「解釋世界」，更有心於「改變世界」。在東亞儒家的經典解釋傳統中，經典文本的解釋絕對不是一種「概念的遊戲」，而是現實世界

中行動方案的規劃。在東亞儒者的解經事業之中，「是什麼」與「應如何」深刻地合而為一，「事實判斷」與「價值判斷」通貫而為一體，「回顧性的」的儒家經典詮釋行動與「展望性的」對未來的提案，也融合無間。